

Dialogue in the Market . . .

[在市场里交谈]

DIALOGUE IN THE MARKET



汪丁丁◎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秋季至2003年春季，我在加州大学
期间喜欢海边漫步，照例喜欢上网聊天，
在网上聊天，我想像，与某格拉底在市场里和人交谈的情形类似。
如果格拉底的话灵验到我，商量着是到网上去聊，还是到市场里去聊，
我相信我们都会钟情于“网”，而不是“市场”。

Dialogue in the Market [在市场里交谈]

汪丁丁◎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市场里交谈 / 汪丁丁 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8-04747-2

I. 在... II. 汪...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5899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钟智锦



世纪文景

在市场里交谈

汪丁丁 著

出版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n)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405,000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4747-2/F · 1039
定 价 29.80 元

2002年秋季至2003年春季，我在杭州教书。照例喜欢湖边漫步，照例喜欢上网聊天。在网上聊天，我想像，与苏格拉底在市场里和人交谈的情形类似。如果苏格拉底的幽灵碰到我，商量着是到网上去聊，还是到市场里去聊，我相信我们都会更钟情于“网”，而不是“市场”。

在市场里交谈，面对面，对方的身份一般不会成为谈话者关注的问题。在网上交谈，首先成为问题的，恰恰是谈话者的“身份”。我喜欢在网上交谈，一部分理由来自我教学的便利。例如，有些同学不习惯当面批评我，他们会上网，化名（网民的术语叫做“披上马甲”）来骂我，语言可以尖刻到让我难以忍受。

我强烈建议任何一位在乎自己的教学效果的老师，尝试着上网聊天，而且要设法变得习惯于忍受尖刻的批评。这叫做“磨合”——以公开身份上网，接受匿名者的批评。当然，磨合的另一面，是你以匿名身份上网，抨击你不打算面对面抨击的人。

有几位好朋友对我说过，他们也上网聊天，之后便觉很不合算，因为所见帖子，多为“垃圾”，要找到高质量的帖子如大海捞针般困难。这也是事实，不过，在浙大经济学院“经济论坛”这块我们活跃着的绿洲里，上列看法不符合事实。

网和市场一样，是需要“经营”的。经营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意味着一部分资源要从网外流向网内，意味着必须有几个热心分子来设计和运行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热心分子难免在一段时期之后丧失了那份热心，人走茶凉，这是“网络社会”的普遍症状。究其原因，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由于产权机制的缺失。

最典型的例子，试想你、我、他三人，相约网谈某题目，气氛激烈，高潮迭起，思想火花四溅，观众喝彩不绝于耳，我们三人则愈加兴高采烈。此刻，某广告商突然在我们帖子上加贴“有偿新闻稿”一则，无数点击我们帖子的读者，难以避免地会读到最后那篇商业广告文章。这叫做“免费搭车”——小影院故意把自己的电影广告发表在同一张报纸的大影院的巨幅广告的旁边，以争取“扫一眼效应”，曾经引发过美国广告商之间的法庭诉讼。

上面的例子，其均衡状态，不难想像，应当是你、我、他三人，将减少一部分在网上聊天的兴趣——因为注意力会经常遇到上述那种干扰，我们宁愿把重要的讨论题目拿





到茶馆里去聊。

但是，在市场里交谈，如果能够营造比较满意的“均衡”，那么与茶馆里的交谈相比，有一项意味深远的后果，是私人场合的交谈营造不出来的。那就是：交谈者之外的所谓“不在场”者的参与。

既然是“不在场”者，就是说，他们的在场，是在场者无法注意到的。由于网上身份的不确定甚至完全消失，任何发言者，在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布鲁默（Herbert Blumer）和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论的意义上，都肯定知道自己是在“表演”。面对着我们完全不知道的观众——可以是座无虚席也可以是空无一人的剧场，我们的“帖子”，对于我们自己和观众而言，是表演，是主格的“我”和受格的“我”之间的对话，是作为“行为者”的我和作为“评价者”的我之间的对话。这样，我们的个性居然能够通过网上聊天而获得升华！

总而言之，这里不能作深入分析，我的结论是：网络社会，与真实（即每一个人都具有明确身份的）社会一样，必须解决“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才可能获得广阔的发展。而网络社会成员的身份缺失，无疑加剧了自由与秩序的冲突。所以，研究网络社会的发展，特别具有指导我们在真实社会里解决自由与秩序的冲突的意义。

怀着上述的潜意识，我就在网上和咖啡馆里参与营造了一系列的“市场里的交谈”。注意，网上的交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平移到咖啡馆里，只要允许匿名旁听——我们叫做“半公开对话”，典型如我们在杭州“枫林晚”书店的咖啡厅里几乎定期举行的对话，厅的一侧是参与对话的几位老师和朋友，另一半则是认识和不认识但听说了我们的对话而有兴趣来参与的客人。

我把这些网上和咖啡馆里的对话整理出来，作为这本小册子的后半部分。在前面的部分，我收录了同一时期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它们都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之后经我编辑过的。

贯穿了这本文集的对话和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应当叫做“生命之树长青”。只不过，若是真把这句话拿来当这本书的题目，就会显得很奇怪。“生命（living）”是动词，不是名词（“life”），因此也翻译成“活着”。它告诉我们，理论必须面向生活，否则就没有了生命，就变成了王静庵先生批评的“可信而不可爱”的东西。

市场是多么富于生活气息的地方呀！想想荷兰画家阿特斯的那些作品，以写真主义手法精美描绘的满载鸡鸭鱼肉干鲜果品的柜台，上面悬挂着刚刚宰杀的牛和羊，下面堆放着新鲜的鸡蛋，站在市场阴暗背景里的是被耶稣基督指出来犯有通奸罪的那位妇女。与新兴市民阶级的新兴生活相比，圣经的教条显得那么苍白。

还是“知识过程”，还是“人生体悟”，还是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决定了我自己的理论与生活。

1. 经济学与人文关怀 1

- 经济学试图从“物”的维度解释人类行为；人文学试图从“心”的维度解释人类行为。注意：“解释”只是为了比较。“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世界，经济学在寻找解释时，是“经济科学”；人文学的目的在于为生活提供/寻找“意义”而不是或不仅仅是解释，经济学在理解并进而寻找意义时，是人文的。

2. 本土问题意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性 4

- 每一个地方的学术都要有自己的乡土性，也叫做“本土性”。如果我们不注重中国学术的本土性，那么，放弃了植根本土的个性之后，我们的学术研究机构就会变成外国或者外地学术中心的“殖民地”。
- 评论

3. 经济学话语的三重紧张 31

- 以任何一套经济学话语为出发点，我们可以考察该话语体系力求缓解的三重紧张关系：(1) 经济学家的“意图”与其话语的“客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2) 被经济学家群体确立为“客观”的经济学话语与现实经济格局之间的紧张关系；(3) 现实经济格局与经济学家的意图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作为专业群体的经济学家便可以被“嵌入”中国当下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内。

4. 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 38

- 当我们从行为学和神学这两个方面为经济学划界以后，在人类行为的集合里面，就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大约小于1%的领域，是我们经济学家应当研究的领域，即可以当作“理性选择”的结果的并且具有“主体间客观性”的那类行为。





5. 关于“演化伦理学”的对话 54

- 到了冰川期降临的时候,如果仅仅按照血缘关系来维持人类合作,那么生活在一个洞穴的一群人(氏族),就不会与其他洞穴的人群建立合作关系,这样,他们往往就生存不下去了,因为经济的规模太小,不足以应付严寒时期。我们关心的是,在那些洞穴里,什么样的家族,能够突破血缘关系的束缚,去建立更广义的道德观念,从而与其他洞穴的人群合作呢?回答应当是:那些为了建立外族的合作关系而勇于反抗甚至破坏本族成员内部合作精神的部落。
- 评论:经济学家的求索精神

6. 探索“法治中国”的法与经济学 69

- 中国法治的前提或基础,是中国市民社会,它有三个维度,首先是经济学的维度,即“物”的秩序;其次是法学的维度,即“人”的秩序;最后是道德哲学的维度,即价值取向和“精神”的秩序。

7. 当代经济学的行为学转向 74

- 我倾向于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作一种双重的承认:首先是对心理学家卡尼曼和茨沃斯长期倡导的“基于案例”的决策理论的承认,其次是诺贝尔委员会1994年承认博弈理论之后,顺理成章,对实验经济学的承认。

8. “信誉”在从猿到人演变过程中的意义 77

- 信誉造就了广泛的社会交往潜力和信息网络,当最后一次冰川期迫使人类更迅速地扩展社会交往范围时,大脑皮层的神经元结构便发生突变,为人类带来了语言能力。

9. 关于“需求曲线”的对话 88

- 严格的经济分析,要求我们现象学地还原到那个行为者的主体性里面去,设身处地看待他(她)眼睛里的商品,不要试图把商品随意分类,按照我们的意思,或者通常所说的意思排列出来。
- 评论:博士文凭与“需求曲线”
- 评论:需求定律与吉芬现象

10. 哈耶克与21世纪的中国 111

- 哈耶克的幽灵没有随着“两大阵营”的瓦解而消失。只要存在人类理性对传统的反抗,存在知识传统之间的竞争选择,存在以“效率”的名

义推行的文化歧视,人们就会不断反思和试图超越哈耶克的演进知识与演进道德哲学。

11. 教育体制改革的三个核心议题 117

- 第一个核心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是“路径依赖”的。……第二个核心议题是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的形式与教育的内容之间的“相容性”——compatibility。……第三个核心议题是教育成果的可考核性——accountability。

12. 有限理性与脑神经元网络的可预期行为 135

- 我们看到的动物都是“有限理性”的生物,从最低级的单体细胞,到目前最高级的生物形态,都不具有完备理性。

13. 由“SARS”引发的经济学和伦理学对话 158

- 由“非典”引起的伦理学话题是这样的:假设叶航是广州市人民医院的院长,假设该院仅有两名能够做“有创呼吸”的医生,他们都是主治医生。假设其中一位医生已经在给第一位非典患者做有创呼吸时感染并去世。假设在缺乏有效防护措施的条件下,做有创呼吸的医护人员的感染率接近100%。假设叶航院长已经知道,医院接收了上百名新的“非典”患者,而且,还可能每天再新接收几十名“非典”患者。叶航还知道,短时间内不可能有新培训的能够做有创呼吸的医生,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医护人员防护手段。
- 现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另一名非典患者进入了“极危期”,如果不进行有创呼吸,将几乎以100%概率死亡。叶航院长面临的医学伦理问题是:要不要为了抢救这名患者,让仅存的主治医生承担几乎100%的感染风险,从而让其余的全部患者失去主治医生?

14. 理一分殊 259

- 每个人如果仅仅生活在一个“条理”当中,就是他分工所在的那个条理,他安身立命的那个专业,这就使得分工的协调变得十分困难,社会成员之间缺乏理解。这是涂尔干、哈耶克和当代的贝克尔都论述过的事情。用哈贝马斯的术语,叫做“交往理性”的缺失。这样的现代社会,极易发生危机。比较典型的,就是当前发生的“文明的冲突”。

附录 266



1. 经济学与人文关怀

2002年11月21日在浙江大学“登攀节”的发言

经济学试图为世界提供“理性选择”的实证分析。人文学试图为世界提供“人”在其中生存的意义。

“意义”是多层次的。首先，它是行为主体对世界的“理解”。其次，这种认知过程本身可以具有值得追求的意义。第三，意义是行为主体在其理解的因果链条中意欲追求的任一环节。最后，意义可以成为行为主体对“此岸”世界之为一整体的“超越”，即作为“信仰”的“意义”。

显然，在“理解”/“阐释”之外，“意义”也意味着“行动”，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成为“可观测的”和“实证的”。所谓“外化”，越是“非私人性”的行动，即“社会行动”，其“意义”的昭显就越具有“主体间客观性”（intersubjectivity），即要求假设“他人的自我”之存在性。

但是，那些最高层次的意义往往是最私人性的，从而最缺少主体间客观性，故而最不能纳入实证分析的框架。另一方面，那些最高层次的意义往往最具有持久的和根本的影响力，它们往往决定了人的长期和核心的行为目标。

经济学试图从“物”的维度解释人类行为；人文学试图从“心”的维度解释人类行为。注意：“解释”只是为了比较。“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世界，经济学在寻找解释时，是“经济科学”；人文学的目的在于为生活提供/寻找“意义”而不是或不仅仅是解释，经济学在理解并进而寻找意义时，是人文的。

马歇尔（A. Marshall，《经济学原理》）说过：决定人类行为的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一类是经济的，一类是宗教的。韦伯（M. Weber）特别区分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后者用于解释追求意义的人类行为（“意义”最大化）。

从“物”的维度看人类行为，每一个人都是平均的、无差异的和无个性的。非如此而难以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心”的维度看人类行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惟一的。非彰显其“个性”而难以成就其“人生”的“意义”。于是，前者符合黑格尔（G.W.F. Hegel，《逻辑学》、《哲学全书》）为“量”（quantity）所下的定义；后者





符合康德 (I. Kant, 《逻辑学》) 为“质”(quality) 所下的定义。质的表达必须是“叙事”(discourse) 的, 而非“定量”(quantification) 的。

故而, 有“非实证的”理性选择(“价值理性”之类), 有“实证的”理性选择(“工具理性”之类), 有“实证的”非理性选择(“图腾与禁忌”之类), 有“非实证的”非理性选择(“信仰事件”之类)。

何谓“理性”与“理性选择”? ——“理性”的拉丁文“ratio”, 又源自希腊词根“logos”, 意思是度量和言说。“选择”的意思包括了“alternative”, 即转向其他的可能性, 还有“比较”的意思。

“理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最大化”, 如阿玛蒂亚·森 (A. Sen) 所论。但最大化“什么”? 这是个问题。经济学家试图把“信仰行为”也纳入主观效用的最大化框架(“此生”与“来生”效用的加权和), 解释力颇有限且不令人信服。(参见汪丁丁的文章《宗教行为的经济学解释》, 《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4期;《被建构的宇宙和被解释的宗教》, 《读书》2002年第8期。)

“理性”的第二层含义是“自恰性”, 亦如森指出过的。但世界的量子论解释恰恰基于玻尔的“互补性”原理, 即“逻各斯”通过对话而昭显自身(尼尔斯·玻尔《知识的统一性》, 见《哲学论文集》), 而非“因果性”原理。后者只对特定的观察者而言构成“自恰”世界, 对全部观察者而言则构成“矛盾”世界。

“选择”, 首先要求有选择的自由(可以转向另外的可能性), 其次要求选择者有认知各种可能性的能力, 最后要求选择者有落实其选择的意志力。可惜, 在这三方面, 经济学假设都存在失效的“边界”, 所谓三个“boundedness”——“bounded rationality”, “bounded will-power”, “bounded self-interest”。来自行为学的实证研究表明, 当人的选择接近了上列的三类边界时, 选择行为将系统地显著偏离经济学“完备理性”假设下的行为模式。

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1994, *Choosing What to Choose*) 说过“道德成本”这件事。他提的问题是: “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当小偷?” 他的回答是, 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 存在着行为的道德成本。阿尔钦 (A. Alchian, *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 说过: 人们“选择集”的边界是由社会划定的, 即权利的界限。康芒斯 (J. Commons, 1931, *Institutions*) 说过, 每一项“交易”都涉及三类社会关系: 1. 利益冲突, 2. 相互依存, 3. 社会秩序。以上所引, “秩序”、“权利”、“道德”, 都无法独立于特定社会的成员之间的交往、对行为意义的分享和阐释、道德与文化传统。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 (D. North)、巴泽尔 (Y. Barzel)、康芒斯——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秩序/权利/道德”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意义的分享和阐释/道德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人文学家——布伯 (M. Buber)、哈贝马斯 (J. Habermas)、布鲁默——试图从“对话的逻各斯”的角度理解上述“交往/意义/文化”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概括一下：制度经济学寻求人类社会如何在“利益的冲突”中建立秩序；对话的人文学寻求人类社会如何在“意义的冲突”中建立秩序。

但任何人类社会的秩序都同时是“行为模式”以及“共享的意义”。没有“共享的意义”的行为，不能被人群“模式化”。反之，非模式化的行为，其意义（或核心理由）总是主观的，而非“主体间”共享的。

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只要不仅关注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而且还关注配置经济资源的秩序何以确立的问题，那么他就在“秩序”问题上，不得不关注人文学以及人文问题，所谓“人文关怀”。正如同任何一位人文学家，只要关注意义的秩序并且关注“存在”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意识”，就不得不学习经济学知识一样。

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2002年11月21日晚

录音由毛云峰整理

汪丁丁2002年11月24日校订

2003年6月7日定稿



2. 本土问题意识 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性

谈话地点：杭州枫林晚书店咖啡厅

2.

主要对话者：

汪丁丁，简称“汪”，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叶航，简称“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罗卫东，简称“罗”，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汪：现在中国的经济学术中心以及重点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几乎无一幸免地都被形式主义经济学垄断了，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当然，这一趋势尤其与浙大的“求是”传统相悖。很早以前，在评论“甘阳和刘东之争”那篇文章里，我曾说过：“到底有没有中国乡土的经济学？应该是有的，面向中国现实的，注重学术的本土性和独立人格的。后来在天则所接办的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香港）复刊号的发刊词里，张曙光和邓正来提出，要建立中国学术的“自主性”。这个提法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只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学术都要有自己的乡土性，也叫做“本土性”。如果我们不注重中国学术的本土性，那么，放弃了植根本土的个性之后，我们的学术研究机构就会变成外国或者外地学术中心的“殖民地”。比如我们浙大的经济学教育，就可能会变成北大、武大或者中山大学的经济系在这里的“学术殖民地”。

这个问题，即本土意识，本土的问题意识，它与学术的规范化是平行的。对于“思想”与“学术”，我们的提法是：两个都要。这是我的一个大致想法。

罗：就浙大而言，目前的局势尚不完全明朗，不像北大、武大，主攻方向已经很明确了，那就是在形式主义经济学上不断前进，力争与国际完全接轨。这两个地方，重在训练学生掌握经济科学的分析工具，然后写能够在国际一流

经济学刊物发表的论文，这种套路对于很多年轻学生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这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发展方向，是需要讨论的。一直以来，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学科建设的差别的讨论都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社会的事实，它与自然现象到底是否有本质性的区别。

如果认定社会科学的事实与自然科学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显然，一切的形式主义科学范式及其具体的研究手段都可以毫无疑问地适用于社会研究的。如果社会现象和社会中的事实不同于自然现象，则将社会置于以严格假定为基础的形式主义分析方法之下，也许是大成问题的。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经济学自信地断言，社会完全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在那篇影响很大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已经作了透彻和坚决的辩护。然而，不少人还是认为社会的事实不同于自然现象，它涉及到人与人的互动性、情感性、整体性和有机性，其中有相当大的一块，是无法用目前的数学方法来加以研究的。对数学方法，如果不加以批判地推进的话，是相当危险的。同样是经济学家，海耶克、希克斯、缪尔达尔、博尔丁似乎坚决反对不加区别地运用数学方法处理社会经济现象。海耶克29岁以后几乎不再使用数学方法、希克斯60岁以后对早年代表作《价值与资本》评价甚低，反而看重自己中年以后写的几乎连数字都没有的《经济史理论》，至于缪尔达尔，对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批评更是激烈得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人都是经济学中的大师，他们越是到晚年越发现，社会科学的事实是相当特殊的，是动态的、整体的、有机的和形态学的。孤立地、分析性地研究个别的事实，其实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对于社会经济的种种形态，到底如何来把握它，是用分析性的方法，还是用整体性的方法？经济学的实证方法与形式化的现代数学工具在理解社会有机的现象时，是有困难的。数学不是不重要，但是社会现象是如此复杂，今天经济学中使用的数学还难以满足研究上的要求。数学方法虽然无疑强化了经济学作为形式主义科学的地位，但是走过头了也会掉到一个陷阱中去。也有可能出现这种尴尬局面：人们熟悉各种数学工具，可是就是发现不了问题。依我看，在北大的一些学生中已经出现这类情况了。思想性的东西和形式化的东西若不加以合理平衡，必然出现的情况就是热衷于假问题的研究。文章很漂亮，很规范，但是翻来覆去说的东西却看不出有多大的意义。长此以往必然损害人们对真实世界的把握能力，影响经济思想的成长。





刚才丁丁强调本土性和问题意识，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需要考虑，某种科学主义的语境到底是否适合于我们自身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问题。比如一个有良知的学者就不能不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这是一个需要高度注意的特殊事实。经济学家多数不承认这种特殊性，也许从极微观的角度出发，从个体出发，这是对的。所以微观经济学家更加相信经济学的普适性。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从中国的人口占据世界人口的1/5的情况出发，从文化传统角度出发来看中国人的经济行为和中国的经济现象，恐怕情况又会不一样。我觉得，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已经开始倾向于阻止人们提出不符合它要求的问题了，这很糟糕。这种状况一旦与科学体制和主流话语权结合在一起，会形成自我满意的循环。而在这个问题上，数学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取得累进型话语权的基本手段。我们并不否定数学方法，它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应该高度警惕不要让它损害思想和为假问题服务。关于数学的形式化和学术的本土问题，经济学如何能够让两者结合起来，不相互排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北大、武大的做法到底如何，需要拭目以待。

■ 汪： 我再补充一点。应当说，北大、武大的做法还是有贡献的。他们的基本方式都是从香港科技大学拿来的。香港科技大学在创立时，完全是西方经济学在香港的一块“学术飞地”。他们从芝加哥大学招聘主流经济学的老师，然后按照西方的学术传统提出西方人关注的问题，用西方学术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很多人文章，结果学校的排名一下子就上去了。北大、武大等学校，大约受到香港科技大学成功发展的启发，更加注重形式主义的经济学教育，这相当于在中国其他领域早已发生了的“港台化”。

但中国是个大国，“大国无以师小国”，所谓“大风泱泱”。大国在她自己的核心问题，这些核心问题不是西方人所关注的问题，我们也不能这样学香港和台湾。所以，如卫东所说，按照西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写出来的文章，的确能够在西方的期刊上发表，但是放到中国的期刊上，谁有兴趣去读？谁看得懂？哪一篇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过？

最近两年来，在形式主义经济学方面，我认为比较好的一篇文章是邹恒浦在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培养的博士陈志武的《防止串谋的机制设计》，那是在西方学术期刊上能够发表的。但是在中国，我们连“拍卖理论”都没有普及呢，没有拍卖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普及，读者很难看懂“防止串谋”的研

究。再说，陈的学术基础是法国学派的机制设计理论。法国学派本身，我跟周其仁讨论过，受到法国计划经济传统的影响，有机制设计理论的局限性。在中国社会的“大规模转型期”，机制设计理论好不好用，如何用，有哪些问题，我们不太清楚。这里有许多细节上的研究，西方人或许感兴趣，可是中国人不很感兴趣。至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 叶： 丁丁的观点，我基本同意，但在表述和理解上略有不同。对于到底有没有中国乡土的经济学，我想说，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不应该分外国的、中国的。至于应用层面，肯定要考虑各国的不同情况。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我想两个都需要。在应用层面，就是如何更好地将西方的经济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但如果中国经济学者要拿“诺贝尔奖”，一定要在核心理论方面做出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只是把西方形式化的东西拿过来，而没有把它的思想性学过来，离诺贝尔奖只会越来越远，只能永远跟在西方人的后面。因此，今后大学教育中思想性的教育和培养是非常关键的。（浙大经济论坛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性的讨论气氛非常好，我的一个学生考到北大读博士，感到非常憋气，没有人跟你讨论问题，都在埋头做习题、准备出国。）在很多大学里，经济学的思想性和数学的关系都没有处理好。

■ 汪： 经济学，或者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间的。它既要有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即普遍主义的原则，又要有人文科学的个性化——即特殊主义的原则，也就是本土性和本土意义的追求，这就是社会科学所固有的“双重困境”。

刚才叶航说的我都同意，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首先，每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它自己核心的原理。这些原理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普遍主义原理。其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仅仅背诵这些基本原理，那种学习就不应当叫做“学习”。比如说经济学，我们知道，最基本的概念就只有两个——“机会成本”和“租”，这两个概念的展开，就是整个经济学理论。“成本”这个概念，它的经济学定义是“机会成本”，就是青年科斯后来运用这一概念去分析企业 and 市场并且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成本”概念。在他的名作《企业的实质》里，他就是找准了这样一个“成本”概念。可是如果我们仅仅告诉学生这样一个定义：机会成本就是“被放弃的机会中那个





具有最高价值的机会的价值”，然后学生们拿这个概念去“套”任何一个现实问题，那就不配叫做“经济分析”了。为什么这位女士今天穿红色的上衣？学生回答：因为她今天穿红色上衣的机会成本最低。这类回答就不能叫做经济分析，它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样的学生等于什么都没有学到。

为了让学生掌握经济学，我们的教学必须接触现实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人们“成本”的定义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下，哪些因素进入成本，哪些因素进入效用。我们都知道如何运用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的方法，然后我们推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但那是数学。学生们真正要学的，不是数学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场合，去找具体的例子，然后提出经济学的解释。如果他解释得好，那就算学会了经济学。如果他不会解释，如刚才提到的对“穿红衣服”的解释，也就是张五常批评过的“套套逻辑”——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必定是成本最小的。那就不是“学习”，因为他只需要背诵基本原理，不需要思考问题。

任何普遍原理的学习，都是原理的应用和在应用中学习的过程。而应用的过程一定是本土的，只有在本土的社会里，把基本原理运用得纯熟以后，他才算出师了。出师以后，他才可能发现本土问题的全球意义。借用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话说：我们寻求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问题。

当然，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可能得诺贝尔奖了。事实上，森的问题是印度本土的，但饥荒引发的社会选择理论问题具有了全球意义，所以他得到了诺贝尔委员会的承认。因为他的学术不是建立在“西方的问题意识”上，而是基于“本土的问题意识”。中国或者印度的本土实践，完全不同于西方。如果能够发现重大的本土问题，即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问题，他就算“出师”了。根据杜维明的说法，这类问题的研究，正是哈佛燕京社要寻找和资助的研究项目。再说一遍，这类问题，才是我们从哲学角度看更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它们是“本土性的全球问题”。

但是本土问题意识从哪里来？中国正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变局”，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这三重转型交织在一起，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稳定，而西方经济学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已经有了20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是一个人口老化的稳态社会了。两者所面临的本土问题是根本不同的。

西方人关注的经济学问题，大多数在中国人看来是很细小、微不足道的问题。西方的学术体系已经有了很细的分工，一个细小的研究领域就可以养活

一批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国，任何一个细小问题的研究都无法养活哪怕是一个知识分子。你必须“铺开了”去研究，才能活下去。因为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你一辈子只研究一个题目，风险太高，几乎不可能活下来。在转型期的非稳态的社会条件下，等你把一个细小问题的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都投入进去的时候，社会很可能已经不需要你的研究了。在稳态社会里，这样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一个题目就可以养一个教授，或者十个教授。分工很细致之后，经济学问题就可以用数学模型去做了。

机制设计的理论，前人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研究，接下来，就是串谋问题的研究，这也是拍卖理论的一部分。拍卖单项物品的时候，串谋问题不很大，但是多项物品拍卖（packaged auction）时，串谋的机会就增加了。当然，串谋的机会还要取决于拍卖的形式，比如英国式（从下往上公开叫价）、荷兰式（从上往下叫价）、Second Price 封底式的所谓“威克利拍卖”机制，还有日本式的拍卖机制，等等。为什么日本式的拍卖机制串谋行为较少？为什么“打包竞拍”的拍卖机制可以缓解“winner's curse”（胜出者受诅咒）？这些问题都是很细致的学术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作这样细致的研究，因为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国有资产的拍卖问题。比如说，拍卖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观察是：当参与竞拍者的数量（bidder's number）超过7的时候，很多拍卖机制都会出现严重的“胜出者受诅咒”现象。另一方面，当参与竞拍者的数量低于7的时候，容易出现“串谋”问题。

我本人，自1993年撰文介绍实验经济学以来，始终注意跟踪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但是，中国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期内的许多经济、政治、社会、法律问题。你非要去解决拍卖理论和机制设计方面的细致问题，也有意义，但对我们更加关注的大范围制度变迁问题而言，显得意义较小，小道理毕竟取代不了大道理。

如果社会的发展走到一个地方，正好需要十多个教授的共同研究来解决一些细致的制度问题，那么，学术兴趣与现实需要的“接轨”，就恰好接上了。可是，如果社会的“转型”转到了另一个方向，走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地方，该状态根本不需要解决上述教授们共同研究的那些细致的学术问题。换句话说，面对大范围的制度变迁，那些已经做好了或正在进行着的细微的研究工作就显得没有意义。这相当于一个非要呆在中国的外国人，尽管他做着与外国社会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但他的工作与中国社会其实是不相干的。

